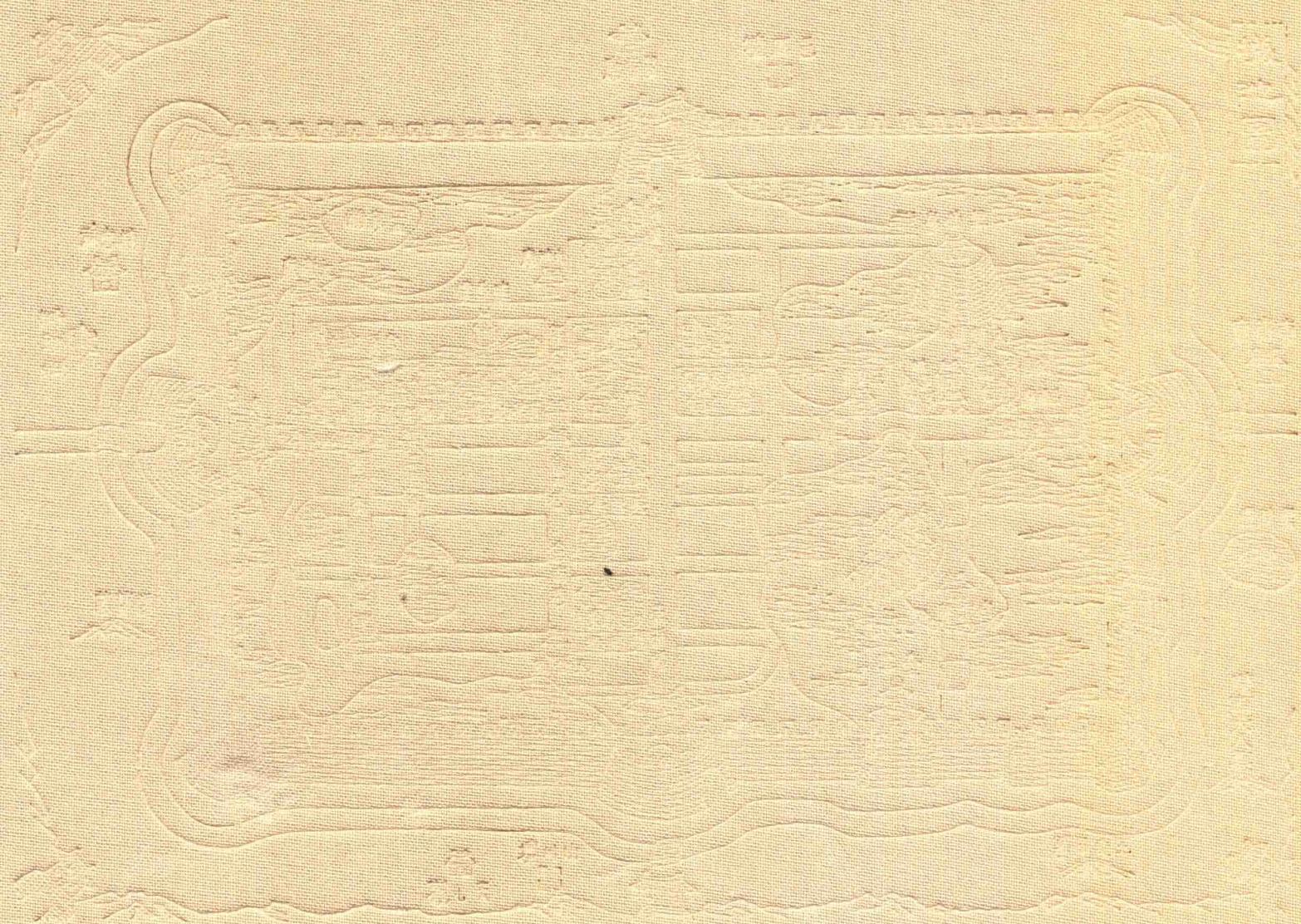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國城市人居环境史圖典

河南卷

王树声 编著



科學出版社
龍門書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國城市人居环境歷史圖典

河 南 卷

王树声 编著



科 学 出 版 社 龍 門 書 局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是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全书以古代文献和图像资料为基础，以每座城市在历史上的具体建设实践为切入点，探寻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脉络和经验，着力发掘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在价值追求、规划要旨、建设模式等方面有别于现代城市规划的特性，进而为揭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现代价值、传承中国本土学术奠定基础。

全书共分18卷，涉及古代城市1400余座，收录城图3500余幅，涉及古代文献3000余部，借鉴前人“左图右史”的传统，以图文并重的方式，努力展示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理想与成就。

《河南卷》通过对古代河南省90余座历史城市的研究，整理出27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32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中原城市建设的人文要义、传统城市空间格局营造、营城学说及其营城理念、传统人居环境营建政策、传统建筑的营建要义、文人循吏对营城之贡献、生态环境治理方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略等方面论述了河南城市人居成就。

全书可供城乡规划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规划设计者、教师和学生参考，亦可供对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园林、文化有兴趣的爱好者参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 河南卷 / 王树声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2015.4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5088-4594-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城市环境—居住环境—历史—研究—河南省 IV. ①X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0524号

封面题字：吴良镛
责任编辑：闫向东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张 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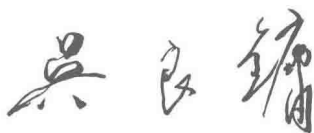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 //www.sciencep.com](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8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62 1/4
字数：1407 000
本卷定价：650. 00元
（全18卷总定价：98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一

近日树声教授将其新著展示于我，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择要认真阅读了几遍，大有收获。凡是对中国历史做过一些研究的人，多少都能对中国地方志的价值有所领会，也必然会对其中的图像资料有所涉猎。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1988年也曾利用夏赴美讲学之便，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中以近三个月的时间查阅、摘抄各种珍本方志图典及相关资料，对后续的研究多有裨益。今见树声教授以12年的时间，持之以恒，多方搜集历史资料，完成了18卷本的巨著，涵盖1400多个城市案例，可谓是一项洋洋大观的宏伟工程，完全可以想见其中的苦心。

这项工程的特色在于它秉承人居科学的思想，以地方志的经典为基础，选择精辟的图典对相关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形态加以分析和小结，凸显不同城市的山河地利、历史人文之特色，纲举目张，眉目清晰，图文并茂，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对多领域学人进行中国传统城市研究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可以藉此增加对传统遗产的形象上的理解。对丰富的城市案例中蕴含的若干规划设计范式加以提炼，形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典范，这就是本书所谓“典”之真义，对我国城市和地区人居环境规划建设的继承和创新予以启发和借鉴。在读完总论之后，我对“中国人居智慧之十点总结”尤为赞赏，当然，对于中国浩瀚之人居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各有发挥，这十点是著者多年学术积累的结晶，是对中国城市人居规划特色的一种宏论，弥足珍贵，颇足思考。

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开创者梁思成、刘敦桢等先贤早已老成凋谢，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二代学者继承术业，颇有建树，必将留诸青史。唯“文革”之动乱、文物之丧失危害甚巨，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成就卓越，但是也存在着大规模建设之破坏、对“与西方接轨”的片面追求带来的对中华伟大文化遗产的忽略，令有识之士深以为忧。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倡导文化复兴大业，并对遗产之保护深为关注，我辈自当勉力工作，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人居文化的精髓，才能以蕴藏于传统中有益于当代的中华智慧纠正现实发展中不利于文化传承的消极的认识。故而此书之成是对学界的一种鼓舞，并期待更多的优秀著作不断问世，迎接中国文化复兴的高潮的到来！



2015年1月30日于北京清华园

序 二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是我国城市史学者新近完成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是我国规划学术界承古开新的一个标志性巨著，贡献独特，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秉承梁思成古为今用的建筑思想，以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运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经验进行基础发掘，采集地方志及历史文献3000余部，其中囊括1400余个城市，涉及古代都城、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并进而从“图”“文”两个方面总结展示这些城市的规划经验和建设智慧，凝铸出这部名实相符的《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为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当代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形象生动的源流参照。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总论中，作者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哲思和建设智慧提炼出十点述要，包括：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基本概念、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遗产、经济繁荣时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与风景的营造理念、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城市规划建设中循吏的贡献、城市规划的文人+匠人营造模式、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中华美德。这些论述是《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作者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中规划建设经验的一个宏观概括，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规划建设所存在问题的关切。实际上，总论在提醒人们，在工业化以来城市规划建设顶礼膜拜的《雅典宪章》道路之外，中国城市还有着自己别样的抉择、别样的精彩。

在此，我要向王树声这样的学者深表敬意。社会高速发展、世事日异、人心浮躁的当今，一个学者能沉下心来带领团队，坚持12年开展遍及全国的调查研究。这不由使我想到了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在国家贫困、战火纷飞的年代进行古建筑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率先走向田野在国内开展民居调查，等等。《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的出版正彰显出中国的建筑学人这种不畏艰苦、矢志不渝的精神薪火不断、代代相传。中国文化复兴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张锦秋

2015年春于古都西安

序 三

中国历史城镇和传统建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地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形态和格局，不仅在物质层面为历代劳动人民提供了生活的场所，同时在精神层面也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精神家园，而且其间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经验，是几千年来我们先哲们智慧的结晶、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重视历史城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同时，运用现代城市科学与建筑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中国传统城市建设和建筑营造的机理，发展传统城市历史文化营建的理论与方法并融汇于现代城乡规划和建设之中，将会推动城乡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王树声教授是我国城市规划史学界的新秀，《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是其十余年学术研究和积累的结果。自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树声教授以敏锐的视角，倾心于中国传统历史城镇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历时12年有余，收集并解读了我国不同地域一千几百座历史城镇的图例，发现了中国传统历史城镇的演变成长机制与现代西方城市规划设计的方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博士后研究阶段，树声教授跟随吴良镛先生研习人居环境科学，数年间与吴先生耳濡目染式的学术交流，其研究视野、学术境界和自信心得到快速提升，渐而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与方法融汇于中国历史城镇图典分析提炼之中，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今著成《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大作，实属水到渠成之必然。

笔者有幸与树声教授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共事近20年，目睹了一位年轻学者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近年来，树声教授针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经验的科学化问题，申报获准并主持完成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多项课题，发表学术论著多篇，逐渐为学界认可并获赞誉，并被评为城市规划史学领域首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作为我校西部绿色建筑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的学术骨干，树声教授与其他年轻教授一起，为我校“西部绿色建筑和人居环境”学术团队的成长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王树声教授长期研究成果《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的问世，实乃人居环境科学和城乡规划学科领域一大创造性贡献，亦必将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值《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专著出版之际，谨表祝贺，是为序。



2015年元月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总 论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且未曾间断的文明。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不应忽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不能把历史文化传统视作现代化的障碍而隔断。习近平同志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①我们应有一种文化自觉的精神，以现代文明的视野重新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使优秀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获得新生命，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而富有中国精神。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载体和重要标志，不仅是休养生息之所，更承载着人们的理想、情感、艺术和价值观念。人在规划建设城市的时候，早已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全都放在物质空间里了，从一地城市，便可窥得一方之文化境界。中国城市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本土规划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精神的优秀规划传统。这是构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历史根基。把中国优秀的规划传统传承下去，不仅是中国当前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城市规划学术传承来讲，更是一个古老的文化大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当且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早在1951年，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在为《城市计划大纲》中文译本所写的序中就指出：

“我们尤其不可顷刻忘记：建筑和都市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他们同时也是文化建设中极重要而最显著的一部分。他们都必须在民族优良的传统上发展起来。”^②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吴良镛先生再次呼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的城市发展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和传承。相当丰富的建筑、城市与景观建设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散见于历代正史和地方志、文学作品等各种文献中。中国城市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虽然近年来陆续出版有关城市史研究的文章，但是总体来讲对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李约瑟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发掘、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我们更需要用浩瀚的城市大典才足以记载、传承优秀的传统城市文化。”^③

一、时代呼唤中国城市规划的优秀传统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了以所谓的“现代”眼光看待问题，长期以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传统是僵死的过去，已经无法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传统与现实及未来是毫无关系的。正如现代学者杜维明所指出的：“把传统限隔在既定的时间坐标系统中，是肤浅的现代主义者所犯的通病。”^④在此背景下，认识到传统的价值是不容易的。对当代人来讲，中国城市规划传统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我们生活在中国，从城市规划历史的学习中基本了解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了解到不少优秀的城市规划案

①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② 1951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编译组译注的《城市计划》所作的序，引自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③ 吴良镛：《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昆仑出版社，2009年。

④ 杜维明：《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

例，对于本土城市规划的历史不能说不熟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城市规划与传统之间似乎还存在着“鸿沟”，传统中的优秀规划思想和方法还未能取得现代学术地位，更谈不上指导城市规划设计实践。由于对中国本土优秀规划传统的忽视，面对规划实践中的复杂问题，从中国文化、中国思维和中国智慧去审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城市规划缺乏中国文化根基。

传统毕竟是传统，不会因社会激荡而断裂，不以人的好恶而消失。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文化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为重新认识传统、理解传统的现代意义创造了条件。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我们认识到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当做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体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就，对于研究、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弘扬中国城市规划的优秀传统而言，仅仅保护好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是不够的，还要挖掘中国深层的规划传统，发掘中国城市规划中跨越时空且具有恒久价值的优秀规划思想与方法，让我们现代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更具有中国精神，更好地指导现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1999年，吴良镛先生在海峡两岸座谈会上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寻找失去的东方城市美学，不止在于对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发扬东方城市的蕴藏。将东方固有的蕴藏加以发掘，加以研究，刮垢磨光，进行新的创造”^①。

吴先生所讲的“东方城市的蕴藏”即指中国城市规划的优秀传统，是一种跨越时空且充满文化生命力的城市观和规划设计观。“我们所说的传统，不是只有历史意义的陈迹，而是紧密联系当前现实并且面对将来潜存着无穷可能的，因此是生命力充沛的传统。”^②这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学术创新和重新拥有“生命力充沛的传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现代学术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我们自家的传统经典，乃是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地所在。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学术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绎读经典为核心和传统，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③

二、《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的基础发掘

欲明研究中国城市规划的传统，自然要把目光投向历史研究。但中国历史上专门论述城市规划的著作，可能就只有隋代宇文恺所著的《东都图记》，这是一部记述隋代东都洛阳城规划的专著，可惜后世失传。因此，一般就认为，中国似乎没有专门的城市规划理论。每每谈及一些中国城市规划的问题，往往从中国文化的普遍特征来切入，泛泛而论，未能触及中国城市规划的内核。例如，谈及“天人合一”，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几乎中国所有的艺术都受到这一精神的影响，体现出一种中国艺术的魅力，例如书画、篆刻、园林、建筑、雕塑等，当然，也包括城市。以“天人合一”论中国城市，并非不可，但对于今人如何在规划理论与设计上把握要点，不免有空泛之嫌。本人也曾就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尝试揭示“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的实践方式，也完成

① 1999年8月6日吴良镛在昆明海峡两岸座谈会上的发言。

②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明报学刊》1986年1~3月号。

③ 刘小枫、陈少明：《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缘起”，华夏出版社，2009年。

了论文^①，但感觉还是主观感悟的东西多一些，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根底仍未能深入触及，说服力还是不够。那么，要认识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要义，至少需要理清几个基本问题，例如，中国先贤营造城市时到底关注什么问题？他们花心力最多的地方是什么？他们对城市的理解与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如何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这些问题虽然看似简单，亦可说其一二，但真正回答起来，没有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很难有本质的推进。因此，需要对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基础文献进行发掘，在历史文献中寻找线索。这就涉及发掘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以下简称《图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历史文献和古代城市图的研究为基础，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视野，结合当代城市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尝试探寻中国原创城市理念和规划设计思想的现代价值，为认识中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传统的要旨，揭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奠定基础。

1. 指导思想

《图典》的指导思想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居环境科学，这为揭示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方法论；二是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问题意识”贯穿了整个过程；三是重视地方城市的规划经验，重视每一个城市的规划价值，从中寻找中国规划精神。

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 吴良镛先生创立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揭示了人类聚居产生、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原理，不仅为认识现代城乡人居环境提供了方法论，也为认识古代城市人居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对于古代城市，与现代相比，物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以物质为中心来展开研究，往往会忽视深藏在物质背后的人与环境的深层关系。人居环境科学告诉我们，人是人居环境的中心，人总是按照自身的需求和理想进行人居建设的。古今物质环境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认识环境、营造环境的价值观念往往具有延续性，其中仍有很多具有恒久生命力的部分。正如王夫之所言：“古今之世殊，古今人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②人是历史的人、文化的人，人的这一属性决定了人居环境建设不能脱离历史文化，不能脱离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更是人居环境建设基本规律的体现。

人居环境科学认为，自然是人居环境建设的基础，从大的环境来看，古今城市所在自然环境虽有变化，但其空间格局依旧。古今是在同一空间中进行人居创造，那么数千年来历代先贤观察、体悟、经营、建设人居环境的“心”，无论如何不能被今天的建设所忽视，这不仅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我们中国城市规划能在世界立足的历史根基和文化灵魂。

《图典》的核心任务就是寻找先贤的人居之“心”，探寻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城市人居价值观及其规划设计的理念与方法。

以当代城市人居问题为出发点 学术研究一般都是立足当代，从研究者看到的现实问题出发，为了回答问题而进行科学探索。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学者还提出了“现实中找问题，历史中找答案”的观点。这都说明了研究不能脱离当代问题。《图典》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出发点，期望在历史中为解决当今

^① 王树声：《“天人合一”思想与古代人居环境建设》，《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 （明）王夫之：《船山全书·〈庄子解〉序》，岳麓书社，2011年。

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中国城市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及特色内涵、新时代城市秩序的构建、城市与自然环境的脱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等方面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对于研究来讲，这些问题犹如一个个探路的风向标，让我们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能凝神贯注地留意历史中有意义的线索，让历史与现实对接，进一步认识历史中的经验和智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历史研究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但研究离不开问题意识。

重视地方城市规划经验 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宏伟的都城规划，更有地区城市的精彩纷呈。吴良镛先生一贯倡导地区建筑学，认为建筑和城市一定要植根于地区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强调地方经验的重要性。在给笔者所著《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中国的文化还都是地区的。”^①在长期的研究积累中，日渐认识到地区人居环境规划设计内涵的博大生动。中国人素有“家园”“故乡”的文化传统，表达了一方人与一方水土的关系。仔细考察中国各地区的城市规划传统，历代规划先贤都是把城市规划深深地植根于一方水土，其人居环境成为一方人物、土地、生活、历史、理想、未来的复杂聚合体，城市成为家园意识最好的物质载体。先贤规划城市既庄严执著又潇洒浪漫，他们的规划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吾土吾民”的文化情怀，一种承载着山川人物的文化基因，一种贯通古往今来的历史精神，一种基于地方自豪而展现出的一种文化竞争和自信，城市成了这一方水土最重要的标志和记忆。通过对地方城市规划的多样化的认识，可以了解其背后的共性，也就是多样性经验背后的根基，这是中国城市规划的关键所在。《图典》关注地方城市规划的经验，尊重每一个城市的规划创造与价值，力图汇集众流，博览通观。

2. 挖掘方法

《图典》的主要用心之处在于做“寻找”和“发现”的工作，从古代留下来的文献中去寻找有价值的史料，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为进一步揭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深层意义奠定基础。因此，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和发现，这就有一个标准的问题。

梁启超先生指出：“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此种目的，则过去的历史如此之多，已经足够了，在中国他种书籍尚不敢说，若说历史书籍，除二十四史外，还有九通及九种纪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栋，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地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资鉴。”^②

钱穆先生也曾说过：“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史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③

由是观之，我们需要留心史料的选择，要从历史文献中发掘那些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史料。“选择事实的标准，是最重要的。凭灵感选择、凭兴趣选择，凭天赋才慧选

① 王树声：《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凤凰出版集团，2008年。

③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8年。

择，都无法将最富有意义的历史事实选择出来。”^①杜维运先生提出了五个标准：美善的标准、鉴戒的标准、新异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杜先生还引用了张荫麟先生所提的五个标准：新异性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标准、训海功能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图典》中对史料的选择标准是由其研究目的所决定的，它是从当代城市规划建设实际和城市规划学术发展的实际出发，凡能揭示中国城市规划特征者，能鉴戒当代城市规划建设者，有助于完善当代城市规划学术者都应予以特别的重视。具体做法如下。

（1）古代城市规划极为重视的一些规划理念与方法，有现代学术价值，亦能直接融入现代城市规划体系者，当首先重视。例如城市结合自然环境的规划方法，城市风景营造智慧，生态环境保护经验等。

（2）古代城市规划极为关注，对今日依然有重要借鉴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融入学术体系者，应特别留心，可能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例如城市人文空间规划，文化古迹的保护，文人对城市规划的影响等。

（3）在古代城市规划中并未普遍应用，或仅为一些地方的独特经验，但对现代城市规划却有重要借鉴意义者。例如经济繁荣时期的城市规划智慧，新旧城关系的处理方法，适应地方环境特点的规划创造等。

（4）古人所言一些重要理念，有助于丰富完善中国建筑理论、城市规划理论和人居科学理论者。例如古人所言“全人”，“全居”，“昭其文”，“进求于精神之地，毋徒拘于形式之间”等。

（5）今日虽无明显的实用价值，但有助于补充、完善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史者。例如有关古代城市的规划建设步骤，没有城墙的城市建设，城市防御体系建设，防洪、治水相关工程技术支撑等。

（6）对中国城市规划人物应予以重视。规划智慧由人而出，记述中国古代的规划人物是《图典》的重要内容。例如规划都城的宇文恺、柳宗元、苏轼、刘秉忠，规划地方城市的余守观、翟凤翥、杨汝楫、王钟鸣、陈善同等。

（7）重视寻找城市的生成脉络，重视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复强调和重视的一些关键点、着力点。例如城市关键地段的规划与建设、城市标志建筑、地方历史古迹等。

（8）重视“图”的作用。中国自古素有“左图右史”之说，特别重视图的价值。“图”就是高度概括的“文”，可言“文”之所不能言。《图典》采用“图”“文”并重的形式，可从“图”中获取一些“文”中无法获得的信息。

（9）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历史文献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凡是能对研究古代城市规划有帮助、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特点的都予以重视。在空间角度之外，还尊重中国文化与先贤营造城市时的关切点，例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水利、生态等方面。

三、《图典》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图典》是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经验的基础挖掘，其范围涉及古代都城、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等1400余个城市。借鉴古人“左图右史”的传统，重视从“图”和“文”两个方面展示每座城市的规划经验与智慧。所谓“图”，就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境图、城图、形胜图、八景图、石刻图、彩绘图等图中选取能够代表城市规划与营造特点的城市人居图。所谓“文”，就是从历史文献中挖掘出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的典型经验，或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称为城市规划建设的经典思想和方法。也就是说“文”就指规划经典，也称之为“典”。这就是《图典》的基本内容与涵义。《图典》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经验的挖掘主要分为都城和地方城市两个部分，共18卷，其中首卷为《天下卷》，其余17卷为地方城市卷。

吴良镛先生在《中国人居史》中首次提出“天下人居”的概念^①，揭示了大一统国家人居建设的特殊创造。所谓“天下”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可理解为具有共同文化秩序原则的空间范围，它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布局和建设。“天下人居”主要包括作为人居中心的都城、天下的文化空间秩序以及联结天下人居秩序的重大工程。这是大一统国家人居建设的创造和标志。《天下卷》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理解，展示大一统国家天下人居的概貌，重点选择了历代都城、典型岳渎城市以及因长城、运河等重大工程而形成的特殊城市格局。都城可谓各个时代城市规划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城市的杰出代表。《天下卷》选取了从西周至明清时期的数十座都城，对其规划人物、规划要点及其历史贡献进行了挖掘和梳理。可以看出，都城作为国家的象征，其规划体现出典章性、纪念性、文化性和理想性的特点。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过程中，把中国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物质空间化，并在空间布局手法上不断走向成熟，形成中国特有的都城规划模式。此外，岳渎秩序是天下文化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选取泰安、华阴、济源分别作为岳渎秩序影响下形成的城市代表，体现天下人居的文化空间秩序。作为大一统国家，往往围绕都城进行一些事关天下整体秩序的重大工程，如长城、运河，这对国家整体城市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下卷》外，其余17卷均为地方城市，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的地方创造，其规划更体现出一种适从性、延续性和多样性。从这些规划经验中，不仅领悟到中国城市规划的丰富多彩，亦能领悟到其共同的规划价值和营造方法，可谓一种共同文化理想下的多样化的人居创造。由于我们所能掌握的历史文献有限，无法涵盖所有的地方城市，只能挖掘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其分布也不均衡。有的省区相对多一些，有的省区相对少一些。对于挖掘城市数量较多的省份，尽可能单独成卷；内容相对少一些的省区，按照地区相近的原则，与较为丰富的邻近省份合编一卷。地方城市的17卷，分别为《北京 天津 河北卷》《山西卷》《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卷》《上海 江苏卷》《浙江卷》《安徽卷》《福建 台湾卷》《江西卷》《山东卷》《河南卷》《湖北卷》《湖南卷》《广东 广西 海南 香港 澳门卷》《重庆 四川 西藏卷》《云南 贵州卷》《陕西卷》《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卷》。

《北京 天津 河北卷》通过对古代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110余个市县历史城市的研究，整理出28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30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辅控京畿的城市防御空间营建、城市人文环境营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略、水利工程的营建智慧、生态环境治理经验、文人循吏之营建贡献等6个方面论述京津冀地区的城市人居成就。

《山西卷》通过对山西省9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29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近30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山水环境之营建、华夏根祖地区人居环境建设、城市文化环境与人文秩序构建、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之调护与治理、雁北军事防御重地的人居环境建设、文人循吏之营城贡献等6个方面论述山西的城市人居成就。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卷》通过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6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12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10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传统城市的营建及其人文理念、近代城市的兴起及营建、近代城市园林的营

^① 吴良镛：《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

建及其人文意义、地方文人循吏的营城贡献等4个方面论述了该地区城市人居成就。

《上海 江苏卷》通过对上海、江苏两省市4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200余幅古代城市图，挖掘并归纳出16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山水人居格局的营造、人文盛区的城市人文空间经营、水利工程建设经验与教训、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4个方面论述本地区的城市人居成就。

《浙江卷》通过对浙江省7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挖掘，整理出28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22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山水人居格局之营建、循吏的营建贡献、传统建筑营建之要义、水利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之经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方略等5个方面来论述浙江的城市成就。

《安徽卷》通过对古代安徽省50余个市县文献的研究，整理出160余幅古代城市图，挖掘并归纳出16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与建筑的营建智慧、文人循吏之营城贡献、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城市人文空间建设、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及水利工程的营建智慧等4个方面论述了安徽的城市人居成就。

《福建 台湾卷》通过对福建、台湾两地60余个市县历史的研究，整理出16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17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海疆要区的城市人居营建、城市人文教化空间营建、循吏乡贤与人居营建贡献、水利治理与自然生态保护经验等4个方面来论述闽台地区的人居成就。

《江西卷》通过对江西省7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220余幅古代城市图，挖掘并归纳出22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山水人居格局的营造、城市人文空间的经营、循吏的贡献及其营造理念、水利工程建设经验与教训、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5个方面论述了江西的城市人居成就。

《山东卷》通过对山东省90余个历史城市的研究，整理出250余幅城市图，归纳出24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典型城市格局及营建理念、文献名邦的人文空间建设、地方人文胜迹景观之经营、地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4个方面来论述山东的城市人居建设特征。

《河南卷》通过对古代河南省90余个市县历史的研究，整理出27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32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中原城市建设的人文要义、传统城市空间格局营造、营城学说及其营城理念、传统人居环境营建政策、传统建筑的营建要义、文人循吏对营城之贡献、生态环境治理方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略等8个方面论述了河南城市人居成就。

《湖北卷》通过对湖北省6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170余幅古代城市图，挖掘并归纳出18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从滨江城市格局营造及其营城思想、城市人文环境建设、楼阁与城市风景营造、地方水利设施修筑、循吏在城市营建中的贡献等5个方面论述了湖北的城市人居成就。

《湖南卷》通过对湖南省6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150余幅古代城市图，挖掘并归纳出17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从区域山水格局及城市营建理论、建筑及人文空间营造理念、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精神传承、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利工程技术、文人循吏之营城贡献等5个方面论述了湖南的城市人居成就。

《广东 广西 海南 香港 澳门卷》通过对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省区110余个市县历史的挖掘，整理出25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30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的整体格局营造理念、传统建筑及人文空间营建智慧、文人循吏之营城贡献及其精神传承、城市水利治理经验等4个方面来论述本地区的城市人居建设特征。

《重庆 四川 西藏卷》通过对重庆、四川、西藏三省区100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30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27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整体人居格局营造、城市人文环境营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生态治理与公共园林营造、城市水利及桥梁建设的经验等5个方面来论述本地区的城市人居成就。

《云南 贵州卷》通过对云南、贵州两省8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15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20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山水人居格局的营造、城市人文空间的经营、文人良吏的贡献及其营造理念、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4个方面来论述本地区的城市人居成就。

《陕西卷》通过对陕西省70余个市县城市历史的研究，整理出22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24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城市营建理念、传统建筑及人文空间营造智慧、文人及循吏之营城贡献、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及水利工程的营建智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居经营、城市历史古迹的保护等6个方面来论述陕西的城市人居成就。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卷》通过对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70余个市县历史城市的研究，整理出210余幅古代城市图，归纳出210余条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经验。并重点从军事战略背景下的人居建设、城市人文环境营造及其意义、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地方循吏对城市营建的贡献等4个方面论述了本地区的城市人居成就。

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智慧述要

对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经验的研究来讲，《图典》只是一种基于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的基础挖掘和发现，同时，基于资鉴当代城市规划的考虑以及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形成的并不是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散点式的呈现。即使这样，从这些散点式的经验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中国城市规划的光芒与博大精深，感受到先贤深沉的规划哲思和建设智慧。结合全书3500余条的规划经验来看，可以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基本概念、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遗产、经济繁盛时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与风景的营造理念、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城市规划建设中循吏的贡献、城市规划的“文人+匠人”营造模式、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中华美德等10个方面进行梳理。

1.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基本概念

要研究中国城市人居，就需要理解人、人居、城市、城市规划等这些基本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通过这些基本概念，了解中国城市深层的文化内涵及其物质环境建设的大义。这也是认识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一个切入点。

每一文化都有其对人的认识和理解，这往往是哲学层面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古代中国先哲和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对这一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在此无需赘述。《图典》所见皆是先贤在人居环境建设中所论及对人的认识。与哲学家论述相比，可以更能直接地感受到人与物质环境建设的关系，体悟物质环境建设的根本追求。如何把对人的认识与具体的规划建设结合起来，落实到物质环境中去，中国本土规划在这一方面卓有建树。

明代耿定向^①所撰《宏道书院记》中指出“人者，天地之心”。对书院建设的目的做了深刻的论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理发育乎万物，参赞之能寄托于吾人，此天地之性，所以人为贵也。人者，天地之心，夫既受形为人矣，而不思为天地立心，恶在其为人哉！诚思所以为人，亟思所以为心者。”^②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乃“天地之心”，从此也可以识得宋儒“为天地立心”之义。人居环境为人之居所，其规划建设必然要考虑“为心”“立心”之事业。这就影响到城市的功能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此外，清代还对“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成德”的概念有所论述。

清人巩敬绪提出了“全人”的概念：“夫人之一身有心、有意、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百体、有冠裳、有动静语默、往来交际，存诸内者，无一念之不可以对天，行之外者，无一事之不可以对人，然后其人之身为全人。”^③人居环境建设就是要考虑到人的全面需求，以更好地化育人，使人成为“全人”，这样的规划设计才算得上是一个基于“全人”的环境。

民国《大通县志》的城池篇，还提出了城乃“上下人心所寄”的观点。“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城池之利，所以御寇盗、防祸乱，亦即上下人心所寄也。”^④“人心所寄”道出了对城市深层结构的认识。城市不仅是一般的物质建设，应该考虑到城市为人之聚居处，有人则有人心，人心是否得以寄放，则是城市规划所以回答的问题。这一点以民国时期河南信阳人陈善同^⑤所论最为精到：“一邑之有建设也，犹人身之有知觉运动也。人身无知觉运动则死，一邑无建设则庶事废弛，民物之生存几乎息矣。顾建设，形式也。形式必有精神贯注其中，而后效用乃出。若徒取形式而已，则亦犹人失其为人之理，具此五官四肢，徒解知觉运动，究何贵哉？吾志建设，吾愿言建设者，进求之于精神之地，毋徒拘于形式之间也。”^⑥此一句为《图典》所见精要者，清楚表达了中国城市的规划观，对于理解中国的城市规划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省南召县，在历史上曾废置数次，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复置县时，邢鸾在《建南召县碑记》中记载：“予窃惟县治之设，所以承流宣化以敷布君德，修政立事以润泽生民也。然善其政教者，几何人哉？今公由怀庆府经历膺原公荐章擢知县事，出宰是邑。营建之余，上德未宣，思所以宣之；下情未达，思所以达之；民生未遂，思所以养之；民性未复，思所以教之；徭役未均，思所以均之；储蓄未广，思所以广之，俾反侧苍生，安居乐业，囿于春台玉烛之中，逃捕黎庶，迁善敏德，化于仁义礼智之区。”^⑦从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人居环境建设所追求的“仁义礼智之区”之境界。

以上这些基本概念，仅仅是《图典》中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些概念，可以体悟到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独特价值，可进一步理解其规划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有知道了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意义的界定，由此展开人与城市的关系，进而理解何谓城市，这是认识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前提和基础。

① （明）耿定向（1524~1597年），字再伦，湖北黄安人（今红安），明代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万历朝任户部尚书。耿定向也是一位著名学者，《明史》谓其学本王守仁，著述丰硕。

② （明）耿定向：《宏道书院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光山县志·卷四·艺文志》。

③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桐柏县志·卷三·建置》。

④ 民国《大通县志·第二部·城池》。

⑤ 陈善同（1876~1942年），字雨人，河南信阳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大理院推事、都察院御史、资政院议员等职，民国年间任河南省省长。

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修信阳县志·卷七·建设篇终》。

⑦ （明）邢鸾：《建南召县碑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南召县志·卷六·艺文》。

2. 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

城市总是在自然环境中建设起来的，离不开自然环境。城市规划如何对待自然、利用自然就十分关键，这影响着城市的特色和气质。我们知道，与自然山水环境相融合，将山林之乐融入城市，这是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显著特点。早在西周时期，丰镐二京的建设就十分重视与山水的融合，后世城市不断深入，结合山水环境的城市规划方法日臻成熟，形成了鲜明的体系。

《图典》所见结合自然规划的例子十分丰富，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其智慧和特点。《江西卷》新淦县中“有天造地设之巧，在人善于点缀耳”^①的观念，可以概括中国特点。城市是在自然环境中的，那如何布局呢？就是首先要寻找自然环境中的“巧”，认识到自然环境中的巧妙秩序，而后人工建设“点缀”在这个自然秩序中。因此，城市规划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发掘自然山水环境原本的秩序，这既是规划的基础，也是规划者修养很重要的方面。隋代两京规划者宇文恺就是一位十分重视自然山水环境的规划大家。笔者曾在《宇文恺：划时代的营造巨匠》一文中，总结了“规划根植于自然，自然乃规划设计之依据”的规划思想：

“在对自然深刻观察体悟之中，把握自然环境的‘特’‘异’‘巧’，由此便确立了人工建设的标尺，使人工建设自觉与自然的‘特’‘异’‘巧’相结合，自然得以妙用，人工得以巧立，人工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宇文恺所秉持的规划设计传统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规划。优秀的规划设计者总是善于发现自然之巧和天地大美，并将自己的创作根植于自然，把自然当成规划设计的一部分。城市、建筑和风景因自然而存在，规划设计因自然而崇高，规划设计的灵魂就是把自然和人工融合为一。看似着力在人工，深处奥妙则是对人工与自然关系的推敲，自然貌似在设计之外，其实早在设计的关照之中。在规划家仰观俯察和运筹帷幄之时，里与外、文与野、实与虚的关系自生于心底。局内之功有赖于局外之力。此正如中国画之留白，以‘计白当黑’之法，统筹天地于咫尺。此乃中国城市、建筑和风景营造之一根本法则。规划设计者的创作灵感皆由此焕发。”^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看自然，不是就自然本身而论，往往带有一种人文意识，把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来看，很难分开来讲。这是观察中国城市与自然关系的特别之处。

就中国城市来看，结合自然山水的具体规划设计手法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城内、城外，只要是自然环境中的形胜之地，或者是风景奇异、秀丽、壮观之处，皆被规划者所驻目留心，将人工建设与之联系为一个整体。例如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处理上，就有“天阙”^③模式。秦代就有咸阳的“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及彭县的“县见山对如阙”^④，后世多有继承创造。汉长安、六朝建康、隋洛阳等都城规划皆循此模式，将城市中的重要建筑与“天阙”相通。到明清时期，在不少地方城市都发现了运用“天阙”模式的案例，例如安徽庐江县，就是以文庙作为城市的中心，背靠城外的塔山，南面直向城南的福泉、凤台二山。清人黄光彬在《清理文庙基地记》一文中，称道：“瞻望城外，其北则塔山环障如

① （明）周文：《枫山冈议》，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新淦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

② 王树声：《宇文恺：划时代的营造巨匠》，《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2013年第1期。

③ （明）盛时泰《牛首山志》：“（牛首山）居京之阳，双峰交踞，晋人状之天阙，岂以其勿庸人力表峥嵘乎？”

④ 清同治九年（1870年）《郫县志·卷五·山川》：“初秦孝王时，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及县见山对如阙，因号。”

屏，其南则两峰对峙若天阙焉。”^①庐江县城处在塔山、福泉山和凤台山之间，规划者正是发现了三山的特殊关系，将文庙置于轴线之上处于城市中心，形成城市格局。犹如宇文恺将东都宫阙放置在邙山与伊阙之间，其理相通，也印证了“善于点缀”的道理。

不仅大的城市格局如此，就是百姓的屋宇建设也有结合远山的习惯，所谓“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此意。安徽贵池县有九华山之胜，其城中居民建屋都喜欢朝向九华山，“居民启户凿牖，务求面之（九华山）而后快”^②，体现了中国城市居民对自然环境的态度。

就城内结合自然环境的规划来看，隋唐长安之“六坡”最为典型，其核心之义就是在城市规划中要寻找形胜之地，要突出形胜之地在城市整体布局的地位。往往会在形胜之地建筑楼阁亭塔，以与周围环境相通，成为一方胜地。当然，有些城市本身就坐落在山上或水乡，自然与山水就有更为紧密的融合。重庆的山城“沿江为池，凿岩为城”，刘道开有诗云，“山从城内起，殿倚堞边开。万井须眉列，双流衣带回”^③。若在水乡，城市规划必然结合水来进行，苏州、无锡、绍兴、温州等城市都是结合水进行城市规划的典范。南宋叶适在其所撰《永嘉开河记》中对水城建设的缘由、特色以及便民之利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一坊一渠，舟楫必达。可濯可烹，居者有操节之利；可载可洵，行者无负载之劳。”“温州并南海以东，地常燥少寒，上壤而下湿。昔之置郡者，环外内城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弈局。永嘉非水之汇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运输、达舟楫也，而以节地性、防火灾、安居利用之大意也。”^④

在城市结合自然环境方面，中国古代的城市图可以说表达得淋漓尽致，几乎每一幅图都把城市与自然山水画在一起。其中有两幅图对当今很有启发。一是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另一个是清代四川南充的《四境图》。《长安图》为现存最早的中国石刻城市图，此图按照比例尺绘制了城市部分，将南部秦岭绘制于图上。吕大防在《长安图》题记中写道“城内用折法，城外取容”的画法。这种“内折外容”的表达方式既关注城内建设部分的比例，又把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标示在图上，清楚表达城内建设与城外山水的关系。清咸丰七年的《南充县志》中收录了《四境图》，分别画了城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山水人文胜迹。其实这四幅图就是对城市四向山水人文胜迹及其风景的一个评价，也是在城市中目观心会的景致，与城市内部的布局紧密相关。虽然《四境图》不是当年规划建设城市时专为规划设计而绘，但它体现了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人关照城市、关照环境的一种方式，告诫城市规划者应兼顾内外，进行整体经营，重视城市与四向风景的关系，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规划设计的“四望”^⑤传统。

当然，在古代城市规划中，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关照到山水，也会出现人工建设未能顾及山水环境而出现城市与山水相阻隔的现象。清人孔尚任曾在《山依亭记》一文中针对城市未能处理好与城外山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非山违人，而人在违山也”的观点。也就是说，并不是自然山水在远离我们，而是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未能重视自然山水，才阻挡了城市与山水的关系，导致在城市中出现了望不见山的现象，这就是“山不违人”的道理，对当今规划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① （清）黄光彬：《清理文庙基地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庐江志·卷十四·艺文》。

② （清）孙溥：《九华城楼纪略》，清光绪九年（1883年）《贵池县志·卷六·舆地志·城池》：“‘吾池数百年胜迹，不图复新于今’，属予为文以表识之。予惟九华一山，江南形胜之最，实池所独擅者，居民启户凿牖务求面之而后快，斯楼峙城东隅，九华耸拔乎东境，适相值焉。”

③ （清）刘道开：《五福宫》，清同治六年（1867年）《巴县志·卷四下·艺文》。

④ （南宋）叶适：《永嘉开河记》，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水心先生文集》。

⑤ （清）霍浚远：《瞻紫楼序》，清光绪二年（1876年）《灵宝县志·卷六·艺文上》。